

赵焰 著

# 李鴻章傳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传/赵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59-0311-6

I. ①李… II. ①赵… III. ①李鸿章(1823 ~  
1901)—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046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mailto: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18 000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7

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17

李鸿章和他庞大的家族从这块土地上获取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李家发迹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耗尽了它的所有,变得穷困而麻木了。当年有着“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也许,对于这块土地,李鸿章的确负债累累。不只是过去,还包括现在和将来。

第三章 曾门弟子 35

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韩信之于萧何。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论学问人格,当时无出曾国藩其右者;论人情练达,处事敏锐,李鸿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国藩应该说是李鸿章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第四章 云中之鹤 53

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

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第五章 洋务运动 65

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政治、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 第六章 如日中天 85

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99

历史显然没有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命运狠狠地将一个烂柿子掷向了李鸿章。阴差阳错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远的岛国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清国致命的一刀。

##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111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满着悲壮,也充满着忧伤,对于李鸿章来说,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威海卫的陷落对于清国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从东北和山东两路,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清国万般无奈,提出了和平倡议。

## 第九章 羞对后生 127

从谈话来看,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

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 第十章 梦醒时分 143

李鸿章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

##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155

西行的所闻所见,对于李鸿章的震撼是巨大的,地球那边的突飞猛进让这个东方老人瞠目结舌。李鸿章感慨说:“这几个月中游历于西方大国,亲身感受到这些国家的新气象,真是让人羡慕……这些国家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优选才能的方法,我都牢牢地学习了,并且掌握了。等我回到国内之后,将重整旗鼓,齐心协力;利用我所学到的,再为我们国家贡献自己的菲薄之力。”

##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 169

对于维新改革,李鸿章的内心一直很复杂。毕竟,戊戌变法是应该迈出的一步,而这第一步刚刚迈出,就输得一塌糊涂,再往下,对于这个垂垂欲老的清国来说,连走路都会哆嗦,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李鸿章甚至因此产生一种绝望,指望由上而下的改革,几乎已经不可能!剩下的,只有麻木而绝望地熬年头了!

##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183

在上一个世纪,李鸿章耗尽了他所有的精、气、神,现在,这个老人与他所服务的朝廷一样变得日薄西山了。李鸿章毕生所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绽,都在最后的时光中情不自禁地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

## 第十四章 忠与奸 199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实际上绝不止李鸿章,能在当年的专制制度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游刃有余的人,都可以说是成了“精”的人物。这样的“精”也是中国文化与制度特有的产物。

##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 213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 后记 220

## 附:李鸿章年表 223

## 楔子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与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就如同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旋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

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象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然而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条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



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些虚空。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这些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是天造地设的，他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拓展自己的内心，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到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

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但近来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

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

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生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

稊，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行动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炽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谲；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嫉贤妒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 19 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

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挪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第一章

鴉片的宿命

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种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所结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细腻而迷人。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机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内

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网络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历史发展到 18 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晰，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

西方大航海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贸易，也开始掠夺。16 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流。到了 17 世纪，新兴的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在亚洲，他们占据了台湾和雅加达进行贸易。到了 18 世纪，英国人取代了荷兰人，张开了更贪婪的大嘴。

西方势力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向东方积极地渗透。在这种格局下，东方处于明处，西方处于暗处。西方慢慢熟悉东方的一切，熟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实力、科技水平等，而对东方人来说，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闭的文化，使得他们始终对于世界那边的国家缺乏兴趣。那些处在明处的东方官僚，漫不经心地，甚至漠视西方势力的潜伏，他们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游戏方式中，没有因沿海的喧哗而丝毫改变。他们一直懒得睁大眼睛去注视烟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终表现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于事无补，因为时间和生命方式的无法改变，人类所处的状态同样无须改变。



1793年，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庞大的使团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这个东方古国。使团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随团成员中，还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这个大规模的代表团一行竟有一百多人，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翻译等；他们还带着大量的辎重行李。在这些行李当中，有大量的礼品，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驾马车、一个热气球，甚至还配备了一名热气球驾驶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国人对于英国产品的注意。到达中国后，代表团强烈要求拜见乾隆皇帝。谒见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许，在各地开设通商口岸。9月14日，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一顶马毛毡搭成的帐篷中漫不经心地接见了他们。来自英国的使者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前，就遇到了一个跪拜的问题。在清国看来，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夷人”并不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馈赠礼物，而是来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国”朝贡的，既是来朝贡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礼。大礼是复杂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马戛尔尼团长起先同意了，但是，作为当时地球上最骄傲也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者，马戛尔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国王施以同样的礼节。由于乔治三世不在现场，马戛尔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随身携带的一幅国王画像施以参拜。马戛尔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气傲的大臣拒绝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马戛尔尼收回了对乾隆行跪拜礼的初衷。八十二岁的乾隆显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有礼貌地克制住了。马戛尔尼向乾隆赠送了礼物，乾隆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这些礼物被堆在宫中的一个厕所里。乾隆还与一个随马戛尔尼来的十二岁的叫乔治的小孩交谈了几句，小乔治已经会说汉语了。乾隆听着这个金发小孩怪怪地说着汉语，很是开心。马戛尔尼对乾隆的印象不错，他后来说：“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乾隆非常亲切有礼，我们十分满意。他是一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六十岁。”